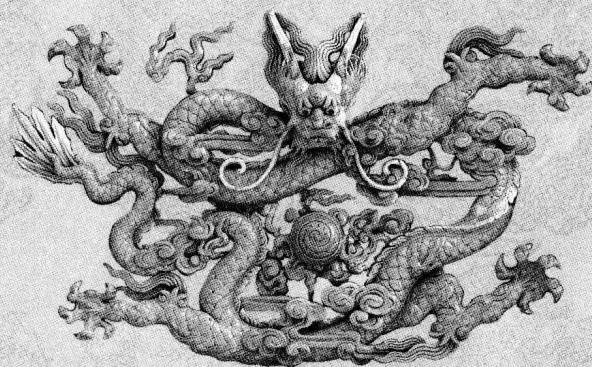


明史全鑒

主編 鄧雪妍

第四卷



红旗出版社



第八章 顽帝身死后无人

正德十五年的闰8月，这时南京的秋意特浓，早晚已是凉意袭人。孝陵松柏的颜色早变得深绿，一股肃杀之气笼罩着江南大地。

朱厚照借着亲征宁王朱宸濠叛乱之机，到江南游玩，至此已有一年多了。他这次南巡在南京停留的时间最多，都市的繁华已经领略够了；六朝古迹，秦淮烟水，已经看够玩腻了。只是向往已久的杭州和苏州还没有去玩，是件憾事。本来两地离南京都不算远，为什么没有去成？作为大明天子的朱厚照来说，连他自己恐怕也说不清楚。“牛首山事件”和从空中坠下的“绿色猪头”，都搅得他心绪不宁，性情烦躁，打不起精神，游兴大减。这一次南巡，许多事情在触动他的神经，其中最主要的是从宁王朱宸濠叛乱中获悉的那些触目惊心的事实：自己平日最信任的亲信却同宁王勾结在一起，广收宁王的大宗贿赂，为宁王谋反做内应工作。从收缴的宁王府收贿者底册来看，这种人还不在少数，其中包括豹房的大管家、心腹太监、朝臣中重要大臣、地方上的镇守太监、地方行政长官……而这一切，在此之前，自己一直被蒙在鼓里。一种被人出卖还不自觉的不是滋味的滋味，萦回心头，久久不去。江南风光再好，恐怕不是久留之地，必须赶快回京，当机立断，对涉嫌朱宸濠谋反事件的大批官员加以清洗，才能度过危机。这件大事胜过了在江南游山玩水的兴头。他决心北归，不再流连江南了。

自从到了江南，住在南京，那些满怀善意又十分诚恳的随行老臣就时加劝阻朱厚照，不要去苏杭游玩，赶紧回京主持国家大事。在北京的朝臣们更是今日一疏，明日一本，催促皇上回京。虽然在皇帝南征期间，一些重要的章奏公文都用快马送到南京，由皇帝亲自批准，可是几件大事，离开皇帝亲临主持，就难办了。比如今年的郊祀大典，即将举行的抡才大典殿试进士，秋审处决罪犯等，缺了皇帝的主祭、临轩策问、御笔点囚等，这些国事就不成其为国事。而且这些事都有时限性，不能随便改期，再加上北京的朝臣们对全国形势、人民起义的危机、北边紧张形势等渲染得十分严重，来加强朱厚照回京的决心。



朱厚照既然自身有了危机感，当前形势也增加了他的现实感，该回去了。

朱厚照这次亲征虽然未与叛逆者交锋打仗，在江南也未放开性子大游大逛，但是他似乎已经显得很疲倦。他这年还不满30岁，即位十几年来，几乎天天嬉戏游乐，长期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过度的淫乐，已经掏空了身子，此时已不再像几年前骑马驰骋于数千里外边关那样健壮了。这次是坐龙舟游江南的，身体不再适应鞍马的劳顿，这恐怕也是他倦游江南的原因之一。

说走就走，朱厚照于正德十五年闰8月7日特意去孝陵向老祖宗朱元璋的陵寝告别。12日从南京起身回京。这天晚上就登上在龙江泊岸的御舟。沿运河航行，16日抵仪真。17日这天他还有闲情，在江口捕鱼。第二天又跑到瓜洲一游，不巧下起雨来，走进民家避雨。当夜就宿于望江楼。18日又坐船从瓜洲涉江，登上金山，到镇江，特意到旧臣杨一清家做客。杨一清，成化进士，弘治时由刘大夏推荐，任副都御史，督理陕西马政，后巡抚于陕西，整顿边务很有成效。正德时，总制三镇军务，修边墙，建墩台。曾与太监张永合计除掉权宦刘瑾。后得罪钱宁与江彬，被排挤归家。他的家在镇江府丹徒县，这次朱厚照到镇江，见到杨一清，据说二人盘桓聚谈了两昼夜，内容如何，不得而知。透露一点内容是，杨一清劝说朱厚照不要去苏、杭，而要赶紧回京。25日朱厚照才又从镇江出发，沿运河直抵扬州，仍住于总督府内。直到9月初才由扬州动身北行。9月6日船抵宝应，又至淮安的清江浦。这里的宝应、白马、汜光诸湖是钓鱼、网鱼的好处所，朱厚照游兴大发，非要泛舟不可。运河西岸有个积水池，朱厚照在池中大泛其舟，正当兴高采烈的时候，不料船翻了个底朝天，这位大明天子竟然落水，左右侍臣大吃一惊，一齐争抢入水救护，七手八脚好不容易把皇上捞上岸，众内侍为之高呼：“万岁龙也！龙狎水。”朱厚照这位“真龙天子”落入农历9月的水池中，这年有闰8月，9月就等于10月，10月的江北天气已经很凉了。在冰冷的水池中洗过澡的朱厚照，狼狈之状可想而知。他那个外强中干的身体，受到冷水的刺激和落水的惊吓，竟然从此染病，一蹶不振，直至病死，身体一直没有恢复过来。

从落水染病以来，朱厚照无心游玩，坐船沿运河北上，经东昌、临清。10月间到天津卫，旋即抵达通州。他的病情在逐渐加重，到临清时，急忙派人把太医吴杰从北京召来诊病。朱厚照见到吴杰时，第一句话就是：“你为什么不早



点来给我看病!”可见他已自知病重，急待知道病势吉凶，不时表现出急躁不安的情绪。太医吴杰诊断后，当然不会向皇上讲真话，只回话说：“皇上万福无恙!”这是一句祝愿的话，也是安慰话，实际等于什么也没说。可是那些跟随朱厚照南巡的心腹太监，对他们主子的病状十分关心，立刻追上太医吴杰去问个究竟。太医压低声音，悄悄地告诉走近的那些熟悉的太监说：“皇上的病已经很重了，恐怕往好里说也只能维持回到北京啊!”江彬也不放心皇上的病，特意也追上来问太医，太医对他不敢说真话，只好给他个宽心丸吃，说：“皇上的病不那么严重，很快就会康复的!”

此时的朱厚照既有生理上的病，也有心理上的“病”。多年来放荡无度的淫乱生活，摧残了他的身体，虚弱已极，再加上翻船溺水，着了凉，染上肺炎的可能性极大。当前我们还无法证实朱厚照究竟患了什么病，但从后来吐血之后就一病不起的情况来看，肺心力衰竭致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他在心理上也有病，除了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他的心腹人、伙伴们都一个个地背叛了他，而去勾结朱宸濠，不能不使他在心理上有一种“众叛亲离”的孤独感，这是一种沉重的心理压力。他的另外一种“心病”是他的皇位继承无人的问题。朱厚照即位第二年就结婚，至今年届“而立之年”，却未得子息，这在民家已构成绝嗣的问题，而在皇家就成为关乎国家社稷安危的大问题了，而且一切政治问题都会由此而产生。生理上和心理上的两病交攻，使朱厚照承担不起，病情恶化，死期将至。

正德十五年10月26日，朱厚照和南巡一行人抵达通州，留住不进京。通州距北京仅20公里，步行用不了两个时辰，骑马坐车至多半个时辰就到了。朱厚照这点路就不肯走，非要在通州驻蹕不可呢？这里面可能大有文章。从朱厚照的行动、群臣的动向和哄传市上的传闻等来考查时，或可对这个背景略知一二。朱厚照离开京城已经一年多了，这期间北京朝廷的情况怎样？他并不托底。尤其是在这次南征时，了解到更多的朝臣和豹房宦官、近臣和宁王朱宸濠勾结的实情，所以他对朝中的情况变化摸不清，对朝中的大小官员也不能完全信任。在没有弄清情况之前，不能贸然回到北京。如果北京有人设好一个政变陷阱等着他，也说不定会有的。在他看来，通州可能比北京更安全些。他急着要办的事情很多，主要是对身边和留在北京的内外官员进行一次政治上的甄别，然后



再惩办一些朱宸濠的同谋者。其次是对朱宸濠及其眷属如何处理。处理方案必须召开有皇室贵戚参加的会议来决定，这是忽视不得的。再有就是处分那些与朱宸濠谋反有牵连而查有实据的内外官员。凡是皇帝暂时驻蹕办公的地方，可以称为“行在”，所以通州就成了“通州行在”。国家的权力中心也移到这里。这就是朱厚照暂不进京的背景。

朱厚照在通州行在传出旨意，逮捕吏部尚书陆完。陆完是在江西按察使任上结识朱宸濠的。他在兵部尚书任上为宁王恢复护卫，大卖力气。在吏部尚书任上接受宁王的意见罢黜官员。太监张永在江西搜寻到陆完与宁王勾结的事实凭证。至此首先逮捕的重要官员就是陆完。接着就是逮捕太监商忠、杜裕、少监卢明、秦用、赵秀、锦衣卫都指挥薛玺、指挥陈喜、监察御史张鳌山、河南右布政使林茂正等，下锦衣卫狱。在这些被捕官员中，有的专为朱宸濠打探朝中动静，有的替朱宸濠在京广施贿赂，有的守门官为朱宸濠的密探出入北京提供方便。其中涉及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司礼太监张雄；另一个是东厂太监张锐，这两个人在后期豹房中权势最大。朱宸濠通过伶官臧贤以结纳张锐，通过太监商忠、卢明以结纳张雄。这些被捕官员、太监是与朱宸濠有勾结或受贿的人的百分之一二。当明军攻克南昌时曾缴获朱宸濠的簿籍文书，其中所记平日贿赂各级官员姓名，包括中央和地方官员，多者受贿数万两，少的也不下千两。据说朱宸濠的军师李士实看见后曾表示宁王施贿是不是太浪费了？当时朱宸濠笑着说：“这些银子不过等于寄存在我的库中一样！”意思是将来他成功了，这些银子还不是他的吗！当时率兵入南昌城的王守仁怕由这本账簿会连累许多人，下令把它烧掉了。11月4日又传旨勒令司礼监掌印太监萧敬、李英闲住，也是因为这两个声势赫赫的太监涉嫌与宁王曾有过勾结。处分逮捕一些官员，也提升一批新任职官员，其中有给事中，也有各省布政使、兵备使、参议、六部郎中、员外郎。任命定国公徐光祚中军都督府掌印，同时也任命了四川、贵州、山西等地都司官员。对南京六部官员做了调整，升原南刑部侍郎金献民为尚书，都御史丛兰为南工部尚书，秦金为南户部侍郎，李承勋巡抚辽东，胡世宁巡抚四川。

正德十五年11月20日，太监魏彬自通州传出圣旨：“令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鸿臚寺、锦衣卫、六科、十三道，每衙门止留佐贰官一



员在京，其余并内阁、皇亲、公侯、驸马、伯俱赴行在。”这道圣旨几乎把北京各衙门除留一名副职处理日常工作外，所有官员都被调往通州行在。朱厚照这一异乎寻常的举动，在当时社会里产生一种震动。皇帝南巡归来，不进北京，呆在通州。不向北京发号施令，而把京中所有重要官员召来通州，想干些什么？于是对此事的种种猜测就到处传播了，有人说这大半是江彬搞的鬼，是不是他想搞政变呢？还有些人哄传，江彬怂恿皇上赶快处理朱宸濠一千人犯，然后接皇上到宣府去游玩，皇上就落入江彬手中了。许多传闻大都围绕江彬而发。其中缘故，不外当时皇上身边几个权势人物，大都受到宁王谋反案的牵扯而失去皇上的宠信。只有江彬仍然是皇上的宠儿。下台者不免把怨恨都集中在江彬身上，说他造反，没有证据，说他不造反，也没有证据。像南京牛首山事件，通州的迎驾去宣府等都在疑似之间，或者是真事，也许是忌恨江彬制造出的政治谣传，都未可知。

据朱厚照自己讲，他召集百官和皇亲贵族到通州来的意图是集议如何审理和处置朱宸濠的问题。大学士杨廷和、毛纪等赶赴通州见驾，提出处理这样的谋反重犯朱宸濠，要先议置于内廷，这就是古代“庙议”的意思，处决重囚也要在京城，这就是“与众弃之”之意。这是国家150余年来的不易成规，必须遵守。通州不是都城，朝廷庙议不能进行。建议处分朱宸濠等犯，要先诏告天下及各处王府。亲征班师要先行告宗庙社稷礼。通州这个地方不具备这些条件。如果草率议处朱宸濠罪恶，则这次亲征有名，而班师为无名。但朱厚照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于通州召开了贵族和大臣会议，条列朱宸濠的谋反罪状。正德十五年12月5日，赐朱宸濠死，亲属10人斩首，已死的被戮尸。

12月10日，朱厚照回到北京，文武百官在正阳桥南迎驾。这一天成了凯旋的献俘日，一队队士兵，一列列马队，军容整齐，刀枪耀日。把俘获的“从逆者”及其家属数千人跪于辇道东西。被捕的尚书陆完和豹房大管家钱宁也被裸体反捆，插白色帜标写姓名。死者都悬头于竿，也标以白帜，数里不绝。朱厚照身着戎装，骑马立在正阳门下，阅视良久，才回宫内。献俘礼毕，罪犯自东安门，穿过皇城而出。远远望去，一片皆白。

至此，朱厚照的第一个忧虑，似乎得到缓解。朱宸濠被处死了，“从逆者”和勾结朱宸濠的人，该处置的已经处置了，内部的隐患似乎也清理得差不多了。



但是第二个忧虑却又逼近了他。那就是他的皇位继承人问题，还没有解决希望。这是一种拂之不去的烦恼，难于排遣。他自从和夏皇后及吴、沈二妃结婚后，算来已经十四五年了，始终没有子女。要说他自己不愿意宿于宫中，与皇后和两妃相处的日子很少，因而没有子息，还有理由可讲。但是他成年在豹房，豹房中的女人很多，都是供他玩弄的，就是在宣府也有个“第二豹房”，其中的女人也不少，为什么他照旧没有子女。虽然他也认了不少义子，但是哪一个都不能充当法定的皇位继承人。他和任何女人生下的男孩，都会是尊贵的皇太子。可是他偏偏没有这个福分。现在



夏皇后像

快30岁了，自己的身体又不好，近来好像越来越坏了，简直有点朝不保夕的样子。皇族和朝臣里一些人曾提出过建议，希望他找一个近亲侄儿辈的人充当预备太子。这个办法实际上就是说他没有儿子，已经定了，找预备太子不过是过继孩子的代名词。他不会相信自己正在壮年会落得个断子绝孙的地步。所以大臣们提出的建议，他都采取拖延的办法，既不同意也不反对，等等看。可是现在时间不等人了，自己不一定那天就要撒手归西了，谁来继承皇位，这是大事。自己死了，万事皆休，但大明朝的皇位一定得有人继承。他也会想到，由于自己至今没有继承人出世，在皇家贵族里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在惦记着这个即将空出来的皇位。想来想去，还是一场空，不去想它，又不可能，真是难啊！

国家最重要的祀典是郊祀大典，别的祀典可以由皇帝委托近臣主持，一但郊祀大典不行，因为这是祭天大典，必须天子亲临，表示敬天的诚意。郊祀大典又有祖宗配位，必须天子亲祭，表示孝心敬祖，这是任何人都不能代替的。朱厚照在南京时，北京朝臣就曾督促他回京主持郊祀大典。皇上不回来，大典



只可向后拖下去。现在皇上回来了，就要补上这一课。

按照明朝郊祀大典规定以郊庙、社稷、先农为大祀，皆天子亲祀。把典从斋戒、传制、告庙、省牲到陈设都大有讲究，几天前就要准备。皇帝斋戒三日后，由陪祀官、分献官陪同下，在内赞礼官引导下行礼跪拜，经过初献、亚献、终献三段行礼程序，才算完成祀典。大典礼数繁缛，主祭人十分疲劳。十五年12月13日举行大祀天地的大典于北京南郊，朱厚照拖着久病之身，出城参加典礼。不想在初献时，分献官和执事官唱行初献礼，跪进皇帝玉帛，此时皇帝要行四拜礼。只见朱厚照只拜了一拜，就伏地不起，内赞官唱“兴”字后，等了一会儿，皇上还是伏在那里不动，这就惊坏了大家，七手八脚把皇上扶起来看时，只见郊坛的青白色光滑的石地上，一摊殷红色的血迹。这恐怕是朱厚照最后一次履行他的皇帝职责了。中国古代皇帝的两项神圣职责：“祀”与“戎”。朱厚照总算和蒙古人打过一次硬仗，这次又在祭坛上呕出最后一口血。

皇上呕血，不能终礼。大家把朱厚照扶回斋宫，郊祀大典也因此停止举行。皇上在斋宫中休息了一宿，才回到宫中。第二天朱厚照又强打精神，参加了在奉天殿举行的有文武百官参加的郊祀庆成礼，但传旨不举行宴会了。

朱厚照在临死之前办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把兵部尚书王琼，改任吏部尚书，而任命兵部侍郎王宪为兵部尚书。这个改动的原因，是王琼在任兵部时涉嫌与朱宸濠有勾结，受过贿。但王琼是一位与豹房有关系的人物。这次王琼听到朱厚照南巡归来，已抵通州的消息之后，赶紧跑到通州，面见皇上，可能既检讨了自己收受宁王贿赂的错误，同时也摆了支持王守仁一举平定宁王叛乱的功劳。更重要的是王琼长期与豹房有关系，是豹房旧人，尤其是与一些边军将领的关系，这次救了他。而陆完也勾结宁王，也与豹房中的人物有关系，如钱宁等人，但这次钱宁这些人倒台了，陆完也就成了阶下囚。至于王宪为什么能代替王琼，当上尚书，这和王宪平日与豹房诸边帅的关系加上这次随驾南巡，更接近豹房诸人有关。同时，王宪任大同巡抚时，参加过应州战役，人为兵部侍郎，与太监张忠、都督朱泰镇压过北京附近的民变。朱厚照南征时，又奉命率户、兵、工三部的郎中督理军储，所以这次得升任尚书，是皇上对他的酬劳。

第二件事是正德十六年正月初一日，朱厚照扶病到奉先殿、奉慈殿给死去的祖宗和活着的皇太后行礼，又在奉天殿接受文武群臣和“四夷朝使”的庆贺



礼。命百官中命妇到皇太后和皇后宫中朝贺。朱厚照像这样隆重的临朝受贺的时日不多。这几年到西北到江南，都是行色匆匆，举行这样的体面隆重而周到的朝会不多。可是许多不愉快的事在困扰着这位重病缠身的正德皇帝朱厚照。第一件不愉快的事，是巡抚都御史李充嗣奏报的：正月初一这天，下午寅时（也就是这天的15时至17时）南直隶太平府“东南有星如火，变白色，长可六七尺，横悬东西，复变勾屈之状，良久乃散。”这是一种自然天体现象，却被这位进士出身的应天巡抚引据经史和占星术作了一番联系现实的解释。他认为出现的这颗星就是《占书》中的“国皇星”，梁代普通年间曾出现过，此星出现主有“急兵”。据《春秋考异》的记载：“国皇（星）见，东南兵起，天下急。”又据《风角书》说“凡妖星以五寅日出现。”现在这颗星就是正月初一甲寅日出现，必定是妖星。妖星出现在东南地区，而东南又是现今的国家财赋地区，这里又灾难重重，民力已竭。妖星出现预兆此地将有意外之变发生。朱厚照听了着实着急，叫人赶紧戒谕有关衙门，整饬武备，以防不测。李充嗣这番“天人相应”的说教，既迷信星相，但又很现实。东南局势不稳，全国的局势也同样动荡，这一点朱厚照在南京住了一年多是会有认识的。不管这颗“国皇星”是不是妖星，东南地区早晚要闹大乱子，却是谁都承认的现实。所以第二天就下令免除淮安、凤阳、徐州等23州县的应征粮草。就因为江北地区是个苦地方，而且是元末红巾军最活跃的地方，大概从这时起明朝有不少政治家，都预言过这里即将爆发第二次红巾起义。李充嗣就是这种预言家之一。

临死前使朱厚照最烦恼的事，还是皇位继承无人的问题。这时他的病日益沉重，这个问题就越显得突出。正月9日那天，一位监察御史姓郑名本公，上书说：“过去汉朝、唐朝的中叶，国家继统都有几次断了，当时仓卒地立了几个又昏又弱的皇位继承人，只是贪图个人的利益，而使国家受了无穷的祸害。这些历史教训应当引为鉴戒。陛下正当春秋鼎盛之际，将来会诞生皇子。但是现今各地灾异频繁出现，宗藩也屡次叛变，都是因为皇储未定，他们萌生了觊觎之心。中外臣民莫不怀有隐忧。希望陛下能以宗庙社稷为重，密与执政大臣计议，慎选宗室亲而贤者，立为东宫太子，用以维系天下之人心。”郑本公的上书代表着朝臣们对皇位继承问题的新意向。他们过去曾主张用预备太子的方式解决继位问题，现在则根据朱厚照病重这一新的紧迫形势，进一步提出了直接立



东宫太子问题；这个太子已经不是预备太子，也就是说在朱厚照未死之前就立下皇太子，有备无患，避免仓卒行事。朝臣都清楚，虽然在奏疏中还有什么皇上年富力强，必生太子之类的话，但是实际上皇上已经没有几天活头，生太子的事已经完全不可能。劝皇上还是放聪明点，选立太子，以免后患。但是朱厚照对这件事，一直忧心忡忡。自己虽然也明白此中道理，但却从不一厢情愿。对诸位朝臣的新意见，仍然拿不定主意，只好不理算了。

朱厚照在选立太子一事，长期下不了决心。但是明代皇家贵族阶级的总体利益却不容使这个皇位继承大事拖延下去。代表这种贵族总体利益的是以皇太后张氏为首的皇族势力。过去这个势力可能鼓动支持一些朝臣出面，建议设预备太子的办法，但是这个建议尽管提出过许多次，始终未得到朱厚照的同意，事情拖了几年。可巧朱厚照南巡，离开北京一年多，这是一个空隙，给张太后物色皇位继承人的活动创造了机会。选择皇位继承人，当然要有个目标。最简便的选择办法是从明孝宗系统皇家子孙中选出，如果以朱厚照的行辈为基准的话，有两种选择办法，一种是选朱厚照的从兄弟，这叫做“兄终弟及”；另一种是从朱厚照以下的侄儿辈中选出，这叫做“入继大统”，也就是皇帝没有亲子，而从兄弟的儿子中过继一个，继承皇位。除这两种办法外，是不是还有第三种办法，碍于明朝皇室的“家法”，就难于实现了。比如选朱厚照的伯叔辈的人继位，这是违反宗法制度的，明朝一代只有一例，那就是燕王朱棣夺了侄儿的皇位，做了皇帝。这是一种例外，所以在正常皇位继承时，不采取这种办法。

朱厚照的父亲是明孝宗朱祐樞，他是明宪宗的第三子。在他的前面有两个哥哥，但都在幼年时夭亡了。在他前后面还有宪宗的第四子朱祐杭。朱祐杭与孝宗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弟，也是朱厚照的亲叔父。宪宗死后，按照兄弟顺序，孝宗朱祐樞以排行老三继承了皇位。朱祐杭也就被封为兴王，封国在湖广安陆。宪宗有11个儿子，有的早死，有的太小。剩下的只有孝宗与兴王，是当时皇家最尊贵的宗室家长。

正德十四年6月17日，兴王朱祐杭在安陆逝世，终年44岁。他的长子朱厚燾，时年13岁，就是后来继朱厚照死后皇位的明世宗。此时已被张太后等贵族势力所选中，看样子是瞒着朱厚照的。因为朱厚照回到北京后，并未涉及选朱厚燾问题，诸臣上奏疏建议的还是立东宫太子。不知道朱厚照当时想过没有这



个要立的东宫太子应该选谁？他如果想到朱厚熜，这是兄终弟及，而不是人继自己的东宫太子。可见他并不知道这件暗中活动选继承人的事。

朱厚照南巡，选皇位继承人的事就由张太后这些皇亲贵族来主持。兴王朱祐杭的死讯传到北京后，张太后就以皇上的名义，加恩于安陆兴王一家，不但为兴王之死辍朝3日，还派出专使去安陆主持丧礼。皇太后及文武衙门皆致祭。在朱厚照回京后病重期间，又以皇上手谕的形式，命令兴王世子朱厚熜“暂管府事”，“给养贍米3000石。”不久又批准世子之母的请求，一反常规，使兴王世子可以预袭为王，主持祭事。如果按明朝皇家旧例：“亲王薨，子未封者只给养贍米200石，袭封必俟释服。”而兴王世子朱厚熜却得到破格的待遇。养贍米由规定的200石，提高到3000石。未等守丧期满，就立即承袭了王位。这些待遇都是异乎寻常的。这种特殊的待遇有着特殊的目的，也就是张太后等已经选定了皇位继承人，不管朱厚照同意与否，已经是既成事实。这次选定皇位继承人既是贵族整体意识的表现，也是他们阶级最高利益之所在。

朱厚照的病情日益恶化，太医们明确表示他们的医术已经无法挽回皇上的生命。朱厚照一直卧于豹房的龙榻之上，不能起身。十六年的年关将过，刑科给事中顾济曾奏上一本，他说：皇上患病孤独地在豹房养病，身旁连一个亲人都没有。陛下的安全，不知道由谁来维护？我认为这是十分危险的。古来汉高帝刘邦才卧病几天，臣下樊哙就“排闥直入”说：陛下就不想一想“赵高之事”吗？现今朝臣中肯定会有樊哙这种忧虑的人，但是他们被隔绝在外，无法效忠。希望陛下能慎选近臣，每天要内阁及各部院的官员，轮番值日，了解陛下的起居动静，并负责检验御膳和药物，以免发生意外。陛下要专心养病，那些“淫巧杂剧之伎、伤生败德之事，一切屏去”。从顾济奏疏所反映的情况看，朱厚照在豹房中养病，经常接触的还是那些近侍边帅等人。豹房使他脱离开皇太后、皇后等的监护，隔绝与重要朝臣的联系。这是一种危险的境地，政变、暗杀都会随时发生。病中的朱厚照如何用膳用药都掌握在太监手中，人们对这一点也十分忧虑。比如朱厚照的父亲孝宗皇帝之死，就是因为太医可能受某些人的主使，对热病投了大热的药，致使孝宗虚脱而死。后来朱厚照也曾追查此事，处分了太医，但是主使人却一直揪不出来，原因是由一批内臣和某些大贵族势力合起来，利用医疗失误为掩护的暗杀行动，只好存为疑案，不了了之。



这次朱厚照在豹房养病的处境，可能还不如孝宗好，孤单一人，病魔缠扰，死在旦夕，除随身太监外，再没有人监护，可能的下场是病死，被废黜，被谋杀。朝臣要求要有官员大臣轮值监护，就是防止这些意外发生。大贵族势力在选定朱厚照的继承人之后，可能对这位皇帝已经不感兴趣。张太后似乎也没有关心过豹房中病重的儿子。朝臣中虽然还有人关心这位皇上的命运，但关系基本上被切断了。

正德十六年3月13日的晚间，朱厚照病情突然加剧，面临死亡。这时豹房中静悄悄，帷幔的重叠处黑沉沉，长廊处似乎有什么声音传过来，但没人走过。帐外深处两个太监，一个叫陈敬，一个叫苏进，都是大太监手下的长随，今天值宿，两人早就坐在那打盹儿。几天来值了两个班都没什么事，今天白天看皇上还是好好的，晚膳未有用，这是常事。可是今天下午药也没有喝，病是不是重了，我们也不懂得这些，还是打个盹儿，天明就该换班了。

两个太监正在似睡非睡的时候，忽然听到龙榻上躺着的人，口中发出一种虚弱又急遽的声音，这是皇上的声音：“我，看来是不行了！快，快点去召唤大太监张锐，把司礼监的官们都叫来，要他们把我的临终几句话转达给皇太后，告诉她老人家，天下大事还是重要，应该和大臣商议处理。过去有些错事，都是由我而误，和你这些人（宦官）没有关系！……”朱厚照吃力地说完这几句话，一点力气都没有了，终于抖了抖下巴，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大明正德皇帝就这样在凄惨、悲凉、孤独、绝望的氛围中死去了。

第七篇

垂拱而治

明世宗
朱厚熜





第一章 藩王入继君统

兴王之子，生于危机

正德二年（1507）八月初十日，湖广安陆（今湖北钟祥）兴王府内笼罩着喜气洋洋的气氛，兴王朱祐杭的第二子朱厚熜降生了。这使已过“而立”之年的朱祐杭欣喜万状。七年前，他曾有过一个儿子，但出生后五天即夭折了，为此他与王妃蒋氏悲恸欲绝。此后，他接连有了两个女儿：长女生于弘治十四年（1501），四岁时病死；次女生于弘治十六年（1503）。儿子迟迟不来，使兴王夫妇焦虑不安。现在，七年的盼望终于有了结果，儿子降生了，王位有了继承人。不过，兴王当时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这个儿子日后竟然南面称尊，成为明朝第十代皇帝。而已在九泉之下的他，也因此被迫封为皇帝，入祀太庙，死后享有至尊的荣耀。

既然日后贵为天子，于是朱厚熜的降生也就照例被封建史家蒙上了神灵的光圈，“诞圣（朱厚熜）之日，宫中红光烛天，远近惊异。其年黄河清，庆云见于翼轸者，楚分也。盖识者已知为受命之符矣。”当然这完全是附会之说，不足为据。不过，关于朱厚熜的降生还有一个宗教色彩很浓的传说值得注意。当地玄妙观有个纯一道士与兴王交往甚密。朱厚熜出生的那天中午，兴王有些困倦，凭几打盹。朦胧之中似乎看见纯一道人入宫，忙睁开眼问左右：“纯一来此乎？”恰恰此时，宫人来报世子降生。兴王素信道教，便认定世子是纯一道人给“点化”来的。这个传说反映出朱厚熜与道教的不解之缘。

朱厚熜的父亲朱祐杭生于成化十二年（1476），是明宪宗第四子，其母为贵妃邵氏。宪宗朱见深共有14子。皇长子、皇次子均未成年而死。皇三子朱祐樞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九月继皇帝位。同年，12岁的朱祐杭被封为兴王。弘治五年（1492）成婚，王妃为蒋氏。弘治七年，他从北京来到封国——湖广安陆州，从此开始了在江汉平原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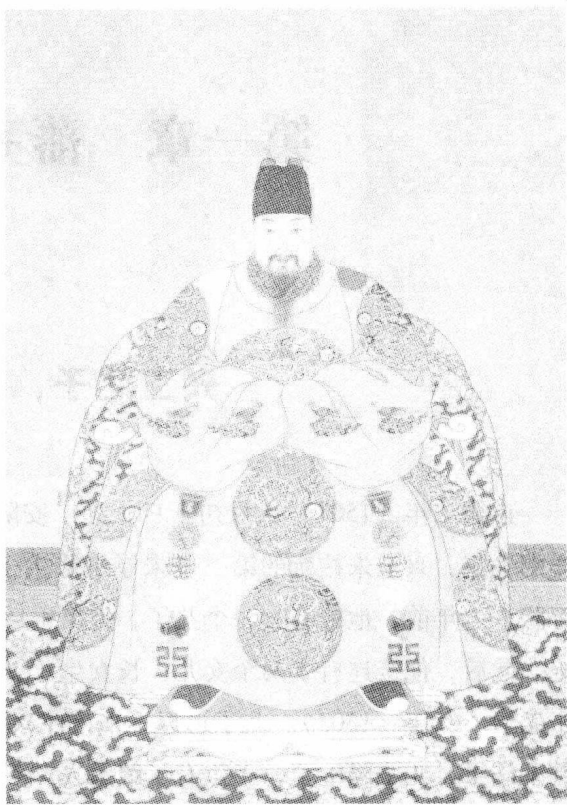
鉴于历史教训，明代中叶，朝廷对藩王的防范之网越收越紧。藩王们分封在全国各地，却仅有小小的一圈王府，并不具有对当地土地的管辖权。他们虽名称“郑王”、“代王”等王号，也不许有任何干涉地方事务的举动。这便是所谓“分封而不赐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致使这些金枝玉叶、皇子皇孙“徒拥虚名，坐糜厚禄”。藩王及其后裔多受过良好教育，又不准参加科举，不许入政府做官。有才略智勇而无法施展，贤德之士不免老死于富贵乡，狂妄之辈则密谋反叛，为祸一方。明代中叶的藩王叛乱，都多少有着这方面的因素。

藩王谋反更增加了朝廷的不放心，越到后来，禁网越密。各地方抚按衙门都有监视王府举动之职责，就连王府中人要出城扫墓，也要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至于藩王之间想串串门，走动一下，更为律条所严禁。

朱祐杭还有一母同胞的两个亲弟弟：岐惠王朱祐棣和雍靖王朱祐枬。说来也很有趣：弘治帝本来要把朱祐杭封在德安，并于弘治四年（1491）为他在德安营建了府邸，后不知何故改封安陆，便让岐惠王去了德安，住进本来为朱祐杭建造的王宫。

弘治十二年（1499），雍靖王朱祐枬也离京赴藩国。他的封地本来定在保宁（今四川阆中），后改封衡州（今湖南衡阳）。这里地势低凹，湿气薰蒸，宫殿朽败得难以居住，王府中常常死人。朱祐枬请求移封山东东平州，廷臣认为重建王府，劳民伤财，建议将雍王移往四川叙州（今宜宾东北），弘治帝先已下诏批准，又因道远不许。雍王只好在朽湿的宫殿中住下来，终日战战兢兢。

朱祐杭与两位弟弟同封在湖广省，尤其是与岐王，相距仅百余里，然格于“二王不相见”的藩王管理条例，兄弟却是无缘相会。兴献王岂没有骨肉亲情，但王章森严，监视紧密，他没胆量也没办法去与兄弟团聚。弘治十四年（1501），岐王朱祐棣死，身后无子，封土自然撤除。至正德二年（1507），雍王府地裂室坏，朱祐枬终于逃不脱噩



明世宗生父朱祐杭像

